

日中共同历史研究有关 九一八事变爆发的研究成果

[日]芳井研一

臧运祜教授和户部良一教授在日中共同历史研究成果中,阐述了九一八事变爆发及其以后中日关系的发展。双方的论述收录在报告书《近现代史》第2部第1章《从九一八事变到中日战争》中。^① 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臧运祜详细介绍了中方对九一八事变的应对,而户部良一则论述了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决策过程。两者的基本态度都是根据九一八事变爆发的原始史料和既有研究成果进行论述,但在判断史实的重要性和对史实的认知方面,双方仍存在较大差距。因此,本文着重于双方的不同之处,在梳理各自的论述之后阐述笔者的认识。^②

一 九一八事变的原因

臧运祜认为,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实施其大陆政策之‘满蒙政策’的必然产物”。^③ 户部良一则认为,石原和板垣策划发动九一八事变的意图,不仅是自卫与维护权益,而且是为了占领包含东北北部在内的东北全境,是“违背了日本政府和陆军指导部的基本方针而发动的”。^④ 臧运祜将九一八事变视为日本此前所贯彻的对外政策的结果。户部良一则强调关东军占领东北的意图与日本政府的“基本方针”存在不同。在探究九一八事变爆发原因之际,双方在选择史料,判断史料所反映出来的历史事实中哪一方面更重要时存在明显差异,从而导致双方论述呈现出这样的差异。

那么,该如何梳理这一问题,并给予评价?首先,就臧运祜的观点而言,九一八事变的爆发是日本“满蒙政策”的结果,这一点已被广为接受。但是,作为“满蒙政策”的必然产物,也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即1931年9月18日没有爆发九一八事变。对这种可能性,从拓宽历史分析视野这一意义上,也有必要加以探讨。比如,日本继续开展币原外交,在与英美等列强协调的体制之下,继续维持“满蒙特殊权益”。这种情况下,即使张学良政权、国民政府和中国人民存在强烈的不满与批判,但因为日本维持权益的目的与列强保护其在中国大陆的既得权利多有重合,故而,作为统治殖民地及势力范围的帝国主义国家日本与列强,就站在了维护共同利益的立场之上。列强虽对如张作霖爆

① 参照 http://www.mofa.go.jp/mofaj/area/china/rekishi_kk.html。

② 请参照[日]芳井研一:《“满洲”侵略与国际孤立化》,《近代日本的轨迹 5 太平洋战争》,东京:吉川弘文馆1995年版;芳井研一:《通往柳条湖事件之路》,高志书院2010年版。

③ 臧运祜:《从九一八事变到卢沟桥事变》,(中方)第1页(以下注释为各自论文的页码),出自日本网上公布的《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报告书》,下同。

④ 户部良一:《从满洲事变到日中战争》,(日方)第1页。

炸事件这种使用阴谋的极端行为持批判态度,但除此以外,大多数情况下会对日保持绥靖态度。如此,日本将不会走上歇斯底里地叫嚣“满蒙危机”以赢取国民欢心之路,而可能选择通过做出一定的让步以维持现状的对策。但是,问题在于事态的发展,正如其后的历史所示,帝国主义国家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压制与统治,终究被迫要在历史进程的某个时点宣告终结。即便1931年日本与列强在协调体制之下能够维持“满蒙政策”,但只要没有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行使武力的可能性便会如影随形。如上所述,若从长时段的角度考察,我认为臧教授的观点是恰当的。

接下来考察户部良一的观点。户部强调日本政府在“基本方针”上没有占领东北的意图。的确,在九一八事变爆发时,无论是若槻内阁还是币原外交,都没有占领东北的想法。否则,日本不仅会招致中国的反对,还会激起欧美列强的强烈批判,在国际上陷入孤立,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但是,正如户部所言,内阁的“基本方针”还能否暂时得以维持?日本政府虽对关东军向齐齐哈尔和锦州扩张的军事行动做了一定的抵制,但自从满铁总裁内田康哉于10月上旬肯定了关东军的行动之后,日本政府也在事后认可了这一现实情况。^①户部认为:“即使在陆军中坚层的强硬论者之间,他们所期待的,最多也不过是希望建立一个可以取代张学良政权的新的亲日地方政权罢了。”但是这一点能否得到印证?内务大臣安达谦藏等人为推翻若槻内阁和币原外交,发动了合作内阁运动。宫中集团为与之抗衡,任命朝鲜总督宇垣一成为首相候选人。就是这个宇垣,在九一八事变后的“9月19日向首相、陆军大臣、本庄氏等进言,劝他们应建立新政权,从中国本土割裂出来,与该政权讨论善后处理”(10月5日日记)。^②10月10日,宇垣与满铁总裁内田康哉会面,在满洲建立新政权,解决“满蒙问题”的方针上达成一致。宇垣在10月24日的日记中预见到根据情况将在“满蒙独立国”或“独立政权”方案中选其一而行。^③关东军和陆军中央,随即抛弃石原莞尔的占领方案,集中到“满蒙独立国”方案上。日本各种政治势力随之赞同。总之,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的“占领”方案与内阁的“基本方针”并非一直正面对立。围绕如何解决“满蒙问题”,日本各种政治势力站在各自的立场上,还提出了几个选择方案。当然,在通史性著述之中很难详细地叙述这种对立,但正因为它与考察九一八事变性质的基本框架相关,所以是不能忽视的论点。

二 华盛顿体制与宫中集团

币原外交的本源,是维持与列强在亚洲协调的华盛顿体制。只要日本保持这种立场,就能获得英美法等列强的深厚信任。日本国内体制中支持币原外交的是宫中集团,尤其是当时唯一的元老西园寺公望。但辅助西园寺政治行动的下一代宫廷人物近卫文磨、木户幸一、原田熊雄等人,与西园寺持有不同的国际认识。近卫等人虽对无视国际联盟决议而扩大在满洲的军事行动抱有强烈的危机感,但没有采取从正面抗衡、压制的态度。宫中集团掌握着下任首相指名权,其核心的政治作用在于灵活运用这一政治立场以协调国内相互对立的政治领袖,通过稳定政治局势以维持天皇制的政治体系。除此后的3次近卫内阁较为特殊外,宫中集团一般不亲自担任政治领袖,而是发挥扶植的职责,支持与宫中(这里指西园寺)持相近观点的政治领袖。因此,九一八事变后若槻首相与币原外相的政治力量减弱,在各种政治势力纷纷迎合关东军的军事扩张路线的形势下,宫中集团为阻

① [日]芳井研一:《满洲事变日志记录解说》,《满铁时局资料调查班 满洲事变日志记录》第1册,东京:不二出版2009年版,第7—8页。

② [日]宇垣一成著,角田顺校订:《宇垣一成日记2》,东京:みすず书房1970年版,第813页。

③ [日]宇垣一成著,角田顺校订:《宇垣一成日记2》,东京:みすず书房1970年版,第815页。

止这种趋势而能采取的对应措施是有限的。前述提及宫中集团为对抗安达内相的合作内阁运动，视宇垣为牵制关东军和陆军中央的人物，提出任命其为首相的方案。这些便是宫中集团所能采取的对应措施。牧野伸显内大臣、木户内大臣秘书官长、西园寺秘书原田熊雄等人，于11月18日将宇垣招至东京与西园寺会面，前提是宇垣承诺与三月事件没有直接关系。西园寺不得不任命宇垣为候补首相。他非常苦恼，但痛苦是不可避免的。西园寺担心此时继续支持币原外交和井上财政，可能会导致对宫中集团的批判突然高涨，使宫廷在政治权力内部陷入孤立。“为了宫中，必须得牺牲些什么”。^① 西园寺之所以会见宇垣，归根到底可以说是为维护天皇制政治体系的基础而不得已的选择和让步。在此过程中，尤为重要的是，天皇及其亲信所形成的政治体系本身承认了“满蒙问题”的解决方案是“满洲国”独立。

三 关于“满洲国”的成立

日本建立傀儡“满洲国”，不仅导致其后中日间的长期战争，也产生了中日之间最大的对立点，导致亚洲太平洋战争爆发。臧运祜认为关东军的行动得到日本政府承认后，迫使张景惠根据“建国方策”成立了“满洲国”。^② 户部良一则详细追溯了行政院长孙科与犬养毅首相为解决事变，通过萱野长知开展交涉的历史，但并没触及其间日本建立“满洲国”的经过。他认为日本当时所考虑的，是前文曾提及的与占领满洲乃至建立独立国家构想相对的，“不过是建立一个可以取代张学良政权的新的亲日地方政权罢了”。其指出“满洲国”成立，并发布建国宣言之后，“陆军领导层已经承认成立新国家”，犬养首相虽持有否认“满洲国”的态度，但旋即遭到暗杀。^③ 即，户部认为日本政府与1932年3月建立“满洲国”没有关联。

但如臧运祜所指，我亦曾指出，片仓衷的《满洲事变机密政略日志》表明日本政府与关东军经密切沟通，商定成立独立国。1932年1月4日，高级参谋坂垣应陆军大臣荒木的要求，在翌日赴东京之际，关东军司令官给其指示是建立“名实兼具的独立国家”。这一指示在1月6日的陆海外协定案《处理中国问题方针纲要》中委婉地表述为“引导使之逐步具有一个国家的形体”；在3月12日提出的内阁决定草案中又稍微修正为“引导之，使之逐步具有一个国家的实质”。但鉴于3月1日已经发表了“满洲国”建国宣言的现状，当日的内阁会议决定接受“满蒙新国家的出现”、引导该国的充实与发展、促进其获得国际承认的趋势。^④ 总之，可以说在1月以后，实质上政府方面也毫无异议地追随、承认了关东军的独立国构想。只不过，包括我在内，称陆军省、海军省及外务省三省于1月6日达成协议的说法可能是不正确的，因为此时该纲要还处于草案阶段。

更为重要的是，天皇和宫中集团在此时已明确承认了九一八事变后的事态。1月8日，天皇发布了赞赏关东军军事行动的诏书。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到达东京之后，天皇召见他并“赐以垂询”^⑤，宫中集团的基本态度发生了变化。列强即便是勉强，对已经发生的事态作为既成事实加以承认的话，宫中集团也会趁机全部承认。众所周知，一二八事变发生不久的2月2日，宫中集团的牧野内大臣与犬养首相会谈时称：“满洲问题的解决好不容易出乎意料地顺利进行着，因英美等的

① [日]原田熊雄等著：《西园寺公与政局》第2卷，东京：岩波书店1950年版，第168—169页。

② 臧运祜：《从九一八事变到卢沟桥事变》，（中方）第3页。

③ 户部良一：《从满洲事变到日中战争》，（日方）第4—5页。

④ [日]片仓衷：《满洲事变机密政略日志》，《现代史资料7 满洲事变》，东京：みすず书房1964年版，第332—333、342—343、494—495页。

⑤ [日]片仓衷：《满洲事变机密政略日志》，《现代史资料7 满洲事变》，第337页。

理解态度而即将收获正果,此时在具有最复杂的国际关系的上海挑起事端是非常不利的。”支持内阁的宫中集团认为“满洲问题”已经解决了,犬养首相也表示“完全同意”。^①

四 从一二八事变到脱离国际联盟

关于一二八事变,臧运祜认为事变始于日本公使馆陆军助理武官田中隆吉为转移国际社会视线所做的策划,而日本海军也有意扩大事变,但因中国第十九路军奋起抵抗,日本焦虑不已,不得不采取增派3个师团等措施。他批评国民政府在停战协定中做出妥协,指出中国军队在上海驻兵的规定,“表现了国民政府在首次对日交涉中的妥协”。^② 户部良一虽在一二八事变的经过、评价方面与臧教授的论述相同,但也介绍了其他研究者对于停战协定的评价,即不割地、不赔款这样的规定对国民政府而言,是鸦片战争以来首次取得的大胜利。^③ 相对于户部良一对停战协定是国民政府“大胜利”观点的特别介绍,臧运祜却认为那是“对日妥协”,两种说法可谓完全相反。同时,户部也介绍了停战协定是经英国斡旋而签订的事实,认为列强希望华东稳定,迅速提出停战协定。在列强压力之下,国民政府不得不妥协。如果这一情况属实,我想还是不要介绍“大胜利”这一评价为好。

接下来是考察退出国联的相关问题。双方在对事实经过的介绍方面基本相同。户部良一认为,李顿报告书既承认中国在东北的主权,同时又主张应该成立顾及日本历史性关系的地方自治政府,“这是顾虑到满洲地区特殊情况的妥当的解决构想,即使是事变之前,在日本也应该能得到一定的评价”。^④ 作为解决为列强所虑的国际纷争的妥协方案,李顿报告书确实可以说是提出了现实性方案。臧运祜称中国政府对于该报告书,“表示大体满意”^⑤,但日本表示强烈反对。

双方的对立点在于日本脱离国联问题。臧运祜认为退出国联“是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制造伪满洲国的必然结果”。^⑥ 户部良一则认为日本当时正在推进热河作战,因为担心国联制裁,为消除国联制裁的法律依据才选择退出国联。^⑦ 臧运祜是从较长的历史脉络中分析这一问题,而户部良一则是就热河作战这一直接契机展开论述。我不太认同两者仅在中日双边关系的框架之中分析该问题,重要的是,日本在欧洲形势与亚洲形势结成一体之时,选择退出国联、走向国际孤立道路的问题。第一,西班牙、挪威、哥伦比亚等小国认为如果不能在这个问题上遵守国联条约的话,最终将会祸及本国,故与绥靖的英国等对抗,导致国联采取严厉的态度。第二,法国对希特勒掌握政权抱有危机感,将这一问题视为本国安全保障的问题。^⑧ 我认为臧教授将“满洲国”有关问题与退出国联相联系起来,以此为中心展开论证是妥当的;也能赞同户部教授的观点,将热河作战作为具体的焦点。但我认为重要的是,日本退出国联的相关问题已经不仅仅是两国间的纠纷,而是世界如何认识、解决国家间纷争的问题,换言之,它是国联和不战条约的理念能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现实政治的试金石。德国也于同年11月退出国联,日德意轴心合作逐渐提上日程。日本退出国联,成为直接通向世界战争之路的前奏。因此,热河作战后缔结的《塘沽停战协定》是不可能结束战争状态的。

① [日]木户幸一著,木户孝一日记研究会编辑校订:《木户幸一日记》上卷,1932年2月3日,东京:东京大学出版社1966年版,第134页。

② 臧运祜:《从九一八事变到卢沟桥事变》,《中方》第3页。

③ 户部良一:《从满洲事变到日中战争》,《日方》第5页。

④ 户部良一:《从满洲事变到日中战争》,《日方》第6页。

⑤ 臧运祜:《从九一八事变到卢沟桥事变》,《中方》第4页。

⑥ 臧运祜:《从九一八事变到卢沟桥事变》,《中方》第4页。

⑦ 户部良一:《从满洲事变到日中战争》,《日方》第7页。

⑧ [日]芳井研一:《“满洲”侵略与国际孤立化》,第79—81页。

日本拽着“满洲国”问题，同时推进华北分离工作。应该看到，亚洲的局部纷争与世界各地问题的关联，与中日全面战争已联为一体。

当时日本的政治领袖怀着天真的期望，认为即便不在国联之中，只要能够维持与列强的协调体制，那么总能找到解决办法，以维持“满洲国”。这种天真的期望正是导致战争持续到 1945 年的一个重要原因。他们不能摆脱在日俄战争媾和过程中所具有的认识，即只要能够与列强调整国际关系，就能维持和扩大“满蒙特殊权益”的想法。他们只在华盛顿体制的框架之内认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亚洲国际关系，而没有认识到在现实国际关系之中，国联和不战条约正在产生政治影响力。

对日本军部而言，甚至华盛顿体制也已经成为其打破的对象，这一点也非常重要。军部作为专业军事官僚集团，日思夜想，考虑和准备的是要怎样在与假想敌苏联和美国的作战中获胜。现实中，军部扩大政治影响力也获得了其他政治势力的容许，获得了日本媒体及国民的支持。

中日双方学者在相互介绍、探讨九一八事变后中日关系变化方面的尝试，是非常有意义的。户部良一详细介绍了日方的情况，臧运祜则对中方的研究动向，进行了立体性介绍，两者使我受益良多。本文虽未涉及，但我希望大家注意臧运祜在论述中结合了抗日救亡运动、东北的抗日斗争与中国国民政府的动向。

从日本的角度描述 15 年战争的经过，可以将这一过程理解为是积极推进战争政策、煽动战争的政治势力和以维持与列强的协调体制作为外交基础的政治势力之间相互妥协的过程。当然，要加入中国国家与民众、亚洲和欧美关系方面的内容，描绘出立体式的历史图景，或许还需要能够做出更加立体式分析的新观点。回顾九一八事变后续发展带给世界的影响，我期待出现新的历史著述，能够从全局上认识到，九一八事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重要原因。

（作者芳井研一，日本新潟大学人文学部教授；译者宋芳芳，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后）

（责任编辑：徐志民）